

现代化背景下的风格塑造

□李鲁平

“风格”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在历史上,有文学自觉的时候,“风格”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理论范畴。简单而言,风格是作品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如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语言个性、情感倾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风格的背后,蕴含的是时代、民族或个人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精神气质等内在特性。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作家个人的人生实践、修养、心理、趣味等,是影响作家和作品艺术风格的内在和外在于因素。

之所以今天风格又成为讨论的话题,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因为文学发展的客观现实和时代环境的巨大变化。显然,对范畴的认识和丰富是在文学的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不断实现的。在经过高歌猛进的3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之后,重新审视当下文学的风格面貌是必要的。

社会生活的纷繁与风格的外在塑造

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多种描述方式。从侧重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容易滋生各种权贵和利益集团垄断资源和机会,也破坏社会向往的公平、法制、秩序。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加速、生态剧烈恶化。从技术的层面看,这是一个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各种新传播方式、新媒体形式等,不断塑造大众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时代。我们之所以常常会对海量充满怀疑或者迷茫,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信息和讯疾的信息传播,而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未得到证实。这一时代特点对大众的心灵和谐所造成的纷扰是显而易见的。从社会的层面看,城市化进程、户籍改革、农民向城市的转移、乡村的重建与城市的融合,是正在急剧演进的社会结构变化。从政治的角度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历史新变的起点,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梦,这是一场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革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创了新的局面,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关口。

15年前的那个冬日的夜晚,我想我跟地球上的许多人一样,都在期待着子时到来的那一刻。千禧年钟声的敲响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物理时间上的崭新起点,更蕴含着人们对于“新世纪”的希望与期待。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消费“新世纪”这一概念,但我不知道这一概念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我只知道好像挺时尚。那时我正在老家鞍山读高一,没白天没黑夜地埋头于茫茫题海,“新世纪”对我而言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记住了那个冬夜里嗡嗡的钟声和广场上人群的喧嚣。从此以后,2000年之前的漫长时光被统统纳入了“80后”这一代人的生命前史,不时被从记忆的深处翻腾出来,伴着种种文化符号一道被矫情而怀旧的情绪缅怀和纪念着。而怀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标新的价值,“跨越世纪”的标签不仅被鲜明地标注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同样充斥于文学史的断代以及文学批评的言说。

2004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本科二年级,刚开始涉足文学批评。这时我才知道,21世纪伊始的短短几年间,“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和表述便已覆盖了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无论你喜欢与否,尚未见到更为有效的概念取而代之。就像不知道“新世纪”意义在哪里一样,我同样不知道“新世纪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我知道有许多批评家与理论家对此有过争论,但也没争论出个所以然来,大家图省事般地都认同了这一概念。这就印证了鲁迅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之所以在我的批评文章中消费这一概念完全是因为我眼前有了一条现成的路,或者说,至少我觉得“新世纪”概念标示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变革前行”的轨迹并且与1990年代的文学历史有效地地区隔开来。

10年之后的2013年,冬日的某一天,我开始写作《英雄话语的涅槃》的书稿。偶然向窗外一瞥,只见北京上空飘荡着厚重的雾霾,眼前的许多景物变得模糊不清。再回到电脑屏幕上来,刚刚写下的副题“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矛盾问题更加突出,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中国道路未来仍然会面临各种风险和考验。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贫富差距扩大、一些领域腐败易发多发等问题,使民族复兴事业充满巨大挑战。因此,这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它需要每个人都充满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需要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我们永远保持开拓创新的斗志,永不停息、永不止步。

在如此纷繁的时代巨变之下,文学如何塑造自己的风格?在琐碎的日常生活成为多数人的生活实相之后,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由集体趋向个体、由固态趋向动荡,由秩序趋向无序,由确定趋向迷茫,由简单趋向复杂,学习惯的“伟岸”、“恢弘”、“昂扬”、“壮美”、“深沉”、“清新”、“静谧”等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何继续在文本中得到有效表达?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现代化背景下文学风格塑造的一个关键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依赖许多细节的解决。首先是作家对当下生活的体验。很显然,当下的时代生活改变了作家接触生活、了解生活的方式,不能说所有的作家都是从信息、媒体、饭桌、闲聊来了解生活,但我们能说的是,的确有不少作家并不了解他们所写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对生动而纷繁的现代化进程获得同感他人的体验,没有任何秘方。我想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了解和体验生活,即我们可以问自己,对所处的时代和生活是否有热情和信心。其次,是作家超越经验的途径和模式。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无论乡村的城市化多么深刻,无论都市的现代化多么迅速,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方式似乎是停滞的,至少不是鲜活、生动的。这正是大多数作品同质化、平庸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种种现象、世相、面貌,但我们表达的却很可能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中的一种感受,而且是人人都有过的感受。

我们读过很多书写打工生活的作品,无非是写打工者在城市中的被歧视、被欺负、受到的不公平,或者写他们对都市的向往、对繁华的梦想,

但蒋韵的《麦穗金黄》只写了三个在城市打工的青年人的简单相遇和对话,却显出新意。一个理发师,一个小姑娘,两次给一个打工青年理发。第一次是小伙子为了见女友,剪了一个像麦穗样的发型,金黄色的头发让小伙子很兴奋。第二次是小伙子遇到车祸身亡,他的同伴请小姑娘出店去理发。小姑娘再次给小伙子剪了一个麦穗样的发型,也是金黄色。小说中弥漫的从麦穗一样金黄的发型中飘荡出来的兴奋、信心、向往,让每一个读者都在感动中获得了力量。小说写的是一个悲剧,但没有哀怨、抱怨、愤懑。三个年轻人打工谋生不易,但又很容易满足,从一个发型便能获得幸福,便能放飞理想,而且他们能按他们这一代人的方式相互对待、相互支撑并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朴实与坚持。我以为这便是时代生活对风格的外在塑造,它体现了作家不凡的经验生活的方式。这种经验只属于当代、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个街道上的某个店面。但它又是超越性的,它让读者在打工题材中感受到了疼痛和温暖。在这里,我仍想提及另外一部作品,即铁凝的《告别语》。《告别语》叙述的是一个小故事,不辞而别逃婚到舅舅家的朱丽,不经意间注意到邻居院子里的大人们常常提醒一个叫小宝的小男孩跟客人说再见,小男孩不但不合作,一心想的是要保姆陪着去捉蜗牛。随着时间的流逝,邻居家的客人来来往往,终于有一天,朱丽听见小宝对一个来做客的小朋友说再见了。朱丽对一个孩子成长变化的偶然发现,由此反省到自己与社会的交往,从而醒悟到自己并不一定比一个孩子更加丰富和成熟,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一个孩子。朱丽决定打开手机,要与外界联系。《告别语》对风格塑造的价值在于,它从人的交往行动考察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困境,由此为当代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时代生活变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每一个人处理与世界交往的方式都是巨大的挑战。很多当代性的问题,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由此提供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便是《告别语》对时代生活的独特经验,当

然也是超越了传统或习惯模式的经验。

思想观念的复杂与风格的内在塑造

风格当然包括许多技巧的成分,如具有个性的语言、造句方式、叙述方式等等,但风格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问题。在当下的环境下,讨论风格的塑造自然需要洞察时代的精神状况。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时代精神状况的典型特征是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思想观念纷杂、社会意识多样。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带来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对全社会的思想和价值准则造成了破坏,有着千年义利之变传统的民族令人惊奇地处处以功利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盛行,对历史不相信、对现实没有信心、对未来没有热情,神圣、崇高、意义均已变得微不足道,剩下只有养生、无为、超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杂的思想和观念激荡中,不少知识分子丧失自己的良知和立场,不断发出令人不解的声音,如“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除夕不放假是隐形福利”、“房价越低的城市越丢人”之类。这些人当然不是没有知识,而是理智地说着谎话,为某种利益服务。复杂的精神状况下,社会生活的情感世界流露出的是苦闷、虚无、虚伪、不满、愤世等各种负面情绪,社会精神生活亟需壮大的是对民族的自豪、对现实的勇气、对自我的自信、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对正义和未来的向往等各种正能量。

在此环境下,作家更应该自觉地认识到真诚、真实对塑造风格的重要性。风格应该是从一个人自己内心深处鲜活地生长出来的创作特色。塑造自我的风格意味着给予自我充分的和自由的表达。塑造风格必须忠于自我,作家必须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思想,而不能为功利、利益左右,要相信在自己内心深处对自己是真的东西对所有人也是真的,没有比我们的心灵更诚实、更神圣的东西。惟有此,才可能发出让读者尊重和共鸣的声音,才能塑造出让读者相信的人物,才

「新世纪文学」是否该终结

□傅逸尘

说创作论”也遭遇了窗外的雾霾一样,似乎有些暧昧的味道。我突然觉得,“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似乎有些可疑,似乎到了终结的时候了。何以如此?我自己问自己。之后我首先就想到了这是“新世纪”究竟要新到哪一年呢?如果说在2010年之前称“新世纪”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2014年了,还能叫作“新世纪”吗?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子“新”下去吧?我就想起我们对1920年以后至1930年以后的文学的称呼,叫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或者上世纪40年代文学、五十年代文学,如此,2010年代后的文学是否可以称为21世纪一十年代文学?而此前的2000年至2010年的文学不妨称之为21世纪初年的文学。我又想到了“新时期文学”的概念,这也是个似是而非定义模糊的概念,但毕竟还有一些内涵的东西让它具有一定的本质意义,从而与“文革”时期的文学区隔开来。“新世纪文学”与1990年代的文学似乎就不具备这样的本质意义的区隔,它只能让我想起中国人对“新”的独特嗜好,一种鲁迅也曾信仰过的进化论的观念。从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看,“新世纪文学”就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学,或言大众化的文学,如果觉得用这两个概念来表述这一阶段的文学不方便,那就不如老老实实地用纪年的方式,即21世纪初年的文学,而此后的文学可以效仿上世纪的称谓,即21世纪一十年代的文学、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在近年来的理论批评中就有淡出的迹象,很多人开始使用上世纪80年代文学,或90年代文学的表述。从长远计,“新时期文学”及“新世纪文学”也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我以为,现在就是它们退出的时候了。

“新世纪文学”应该终结了?这个话题似乎多少有点游离于我的这部专著的题旨之外,但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表述并非徒具形式的意义,形式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内容,也就是说,我用“21世纪初年的文学”进行表述的深层意味在于我对于这一时段的一种理性认知与观念上的转向。

中国新文学学会年会关注文学中的反腐倡廉与生态和谐

□曾庆江

中国新文学学会联合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近日在贵阳召开第三十届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50余人参加会议。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贵州省文联主席顾久等出席。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永健教授主持会议,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致开幕词,副会长谭伟平教授致闭幕词。

此次年会学术研讨的主题为“当代文学中的反腐倡廉与生态和谐”。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中出现描写官场生存状态的小说,彰显了对民主政治的深切呼唤,对善善恶人性的深度拷问以及对文化传承演变的价值评判。但是,由于对人性认识的深度、创作视野的宽度和精神世界高度的差异性,导致创作的良莠不齐。官场生态小说应当力避“生活官场化,官场娱乐化,娱乐人生化”的做法,更不能将官场小说异化为“黑幕”描写。只有对“人性生态”进行深层次透视,才能获得独特的审美效果和深厚的文化意蕴。有学者分析,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主要表现为两大主题:一是揭露官场弊端,弘扬官场正气;二是展现官场中人的生存状态,将官场日常化、世俗化乃至娱乐化。新世纪以来,“官场小说”从日常化和世俗化进一步走向大众化与娱乐化,其意义遭到消解,这种倾向值得关注。对于“官场文学”和“反腐文

学”所潜藏的危机,学者们也多有关注。大家谈到,作为有着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反腐文学”本应对社会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为净化社会政治环境作出巨大的贡献。但在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其干预生活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反腐文学”存在着现代意识与审美精神的悖论,即文学的意味越强,法治的精神越淡,反之亦然。中国当代政治小说的现实描写与历史揭示、思想提炼与精神发掘、形象塑造与叙事艺术,与长期以来政治在中国历史变革过程中的中心位置不相称。如小说描述往往不能由表面现象及于事物本质,由孤立个案及于普遍现象,由事件书写及于人性解剖,由清官政治的人治及于制度改良的法治,由情绪发泄、泛泛而论及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深入探讨等。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多与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写作姿态、思考立场、理论视阈、知识见解等有关。对于“反腐文学”、“官场文学”的重要文本,与会者也进行了深入解读。

“生态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有学者认为,当代生态小说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深厚的忧患意识和敏锐的时代触觉,担负着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观,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摇旗呐喊的社会责任。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又出现了诸多误

区,主要体现在多采用纪实性手法展示生态事件的过程,结构层面单一;其次,将叙事核心放置于具体的事件推行中,使得小说语言成为生态观念的理性传达,伤害了语言艺术所具有的巨大感染力;其三,不少作品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上,缺乏对生态问题的真正挖掘。也有学者认为,当下生态小说存在审美品格稀薄与空缺、价值取向混沌和偏至、思想资源的传统与单向等问题,必须在审美品格、现代生态理论、做实中国具体社会语境等几个方面下功夫,以提升其发展空间。还有与会者对当代女作家新世纪以来的“绿色写作”进行了关注,认为在理念上体现了对人与自然的重新思考以及对生物万物的体贴,在技巧上体现了对叙述空间的拓展,最终把人文关怀和生态关爱融合起来,寻找人与自然互动的和弦。学者们还从生态的角度对区域文学以及相关作家作品进行了审视。有的学者以地域文学为视角,着重解读了其中彰显的和谐精神,认为和谐精神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就要求人们关注研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文化生态学,同时也需要关注研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的文化整合。学者们说,文学中要有对生态整体观的构建,即人类必须遵有生态规律,与其他物种和谐共处,有着对自然生命的敬畏,才能写出独特的人与自然交流的作品。

歌剧《居里夫人》中国首演

本报讯 9月3日,“2014首届天津国际歌剧舞剧节”在天津大剧院开幕。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歌剧院带来了现代歌剧《居里夫人》的中国首演。

歌剧《居里夫人》是波罗的海国家歌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剧中的居里夫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名意志坚强的女性代表,她在生活中历经各种磨难,如丈夫的死亡、由男科学家们控制的科学界对她的消极态度等。该剧作曲家艾尔日别塔·希科拉表示:“我不希望居里夫人是个一成不变的角色,

正像我们从课本中所了解的——一个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搞发明研究的科学家。她应当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拥有自己强烈情感的人。我想要将她刻画成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一个人。”

该剧导演玛莱克·维伊斯基是波兰知名的戏剧和歌剧导演,以先锋的舞台制作著称,曾排演过《蝴蝶夫人》《浮士德》《弄臣》《麦克白》等多部歌剧。他执导的作品“具有十足的现代感,在歌功和表演方面都让观众为之动容”。

(武翩翩)

吴良镛绘画书法建筑艺术展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馆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人居艺术——吴良镛书画建筑艺术展”日前在京举行。此次展出作品囊括了吴良镛各个阶段的书法、绘画作品100余幅,以及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孔子研究院、江宁织造博物馆、泰山博物馆等6项建筑设计工程,全面反映了吴良镛在学术探索的过程中对艺术创作的不懈追求。其中,在绘画技巧上,吴良镛师法正宗,把绘画作为观察生活与自然、感受建筑与环境的方式。无论是水彩还是素描、速写、水墨,取景构图都十分大气,尤其是探索了西洋绘画块面造型与中国艺术线条表现的两相结合,以水色交融的语言画出浓郁的诗意,呈现出典雅的格调和大师的手笔。他的书法透露出对建筑文化的思考和对传统文化的修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这样评论:“在遒劲的笔力中体现出历经世事沧桑而坚持不变的精神品格,同时散发出任其自然的光彩,于俊朗的仪态中透露出谦和包容的学者情怀,堪称知识分子纯粹心灵的墨迹。”(徐健)

人文社推出“镜海译丛”

本报讯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共同主办的“镜海译丛”新书发布暨主题讨论会在京举行。

“镜海译丛”包含《失约之城》《满大人》和《内港》三部作品,主要讲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其中,英国作家奥斯汀·科茨的《失约之城》讲述了一段在澳门流传很广的真实异国恋情,主人公玛莎是在修

道院长大的中国女孩,她与东印度公司职员托马斯的爱经历了种种磨难。葡萄牙作家埃萨·盖罗的《满大人》则讲述一名小公务员在中国的梦幻经历,跟中国的“黄粱一梦”有不少相似之处。法国作家安托万·沃洛金的《内港》讲述的同样是在澳门的一段奇特恋情。该丛书的“内地版”和“海外版”两个版本将同时在内地及澳门地区上市发行。(行超)

首都文化企业30强30佳揭晓

本报讯 9月5日,在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召开的“培育首都文化骨干企业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社和北京日报社联合发布了首届“首都文化企业30强、文化企业30佳”名单。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北京北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四达时代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文化企业榜上有名。

据介绍,首届“首都文化企业30强”和“首都文化企业30佳”以主流价值为取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下,注重企业的综合效益与成长创新。经过五轮严格推

精典博维启动“书影联动”项目

本报讯 9月4日,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书影联动”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这可谓民营文化传媒机构推动图书出版与影视产业深度融合、互相促进的一次有益尝试。

近年来,精典博维始终致力于开展立体综合型文化传媒业务,其影视中心与众多优质影视公司保持密切的多途径合作,成功地售出几十部影视作品版权。此前,精典博维已成功推出了首个“书影联动”项目——与恒业影视在电影《京城81号》中达成战略合作。近期,影视同期书《热血男人帮》也将随电影上映同步发售。据介绍,类似的合作今后将越来越多,以真正实现“书影联动”,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

当天,主办方还同时举行了庞贝《无尽藏》影视版权签约仪式、张巍《暧昧不起》新书发布会,并邀请部分与会嘉宾就版权和影视改编的意义等话题进行了对谈交流。

(王冕)

戴碧湘同志逝世

文化部教育司原顾问戴碧湘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8月12日在京逝世,享年96岁。

戴碧湘,笔名王白石。中共党员。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6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话剧剧本《抓壮丁》(合作)、诗文集《浅水堂剧稿》,主编了《艺术概论》《文化管理学概论》(高原演出六年)和《源远流长》(续集)等。